

## 第一章 日本经济的环境分析

### 第一节 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虽然环境条件有利与否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它却可以对这种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本节对日本经济国内环境条件的阐述主要是以 8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为对象，系统地分析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地价变动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外，在日本经济调整增长阶段中、后期和 70 年代初，公害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节对日本的公害综合治理情况及环境保护的新动向也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分析和研究。

####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日本经济发展

人口既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又是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多种影响。日本在人口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化将从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和保险机构运作、社会需求等诸多方面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

##### （一）日趋深化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

联合国把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7% 的现象称为人口老龄化，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

会，把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4% 的社会则称为老龄社会。日本在 1970 年时老年人口（即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 7.1%，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1994 年日本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14.1%，从此进入了老龄社会的行列。日本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速度快。从国际比较看，老年人口比例从 7% 上升到 14% 各国所用的时间差别很大，瑞典约为 85 年，英国和西德约为 45 年，而日本仅用了 26 年。进入 90 年代以后，日本老年人口比例每两年便增加 1%，1990 年为 12.1%，1992 年为 13.1%，1994 年为 14.1%，1996 年为 15.61%。目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虽然还低于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如瑞典、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但据联合国所做的世界人口预测数据，到 2005~2025 年日本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现象最严重的国家，2020 年日本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25% 以上。<sup>①</sup>

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大幅度提高是导致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两个直接原因。日本人口出生率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始于 70 年代中期。1973 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 19.4‰，1975 年为 17.1‰，1980 年则下降为 13.6‰。90 年代出现进一步降低趋势。1990 年为 10‰，1996 年为 9.7‰。从“合计特殊出生率”（从一个特定的年份各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情况求得的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看，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十分明显，1975 年为 1.91，1980 年为 1.74，1990 年为 1.54，1995 年则降到了 1.43。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对劳动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宁可在较少的子女身上花费较多的钱财和精力，把他们培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能、适应未来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孩子抚养费日益提高，培养较多的孩子一方面将大大降低家庭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夫

<sup>①</sup>〔日〕《日本瞭望》(中文版)，1996 年 12 月，第 2 卷，第 21 期，第 3 页。

妻双方事业发展；妇女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接受教育时间长，使很多人结婚年龄后移；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使婴儿死亡率极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于晚年生活的担忧，从而改变了日本人过去持有的多生子女防老的传统观念；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也是降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的同时，日本人口的寿命却大大延长了。1940年日本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仅为50岁，女性为54岁。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伴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完善，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出现了大幅度提高。1985年日本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4.8岁，女性为80.4岁，1995年则分别上升到了76.4岁和82.8岁。目前，日本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1996年为15.6%）还高于老年人口比例。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日本人口很快就会出现“老少倒挂”的现象。

## （二）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供给和企业传统雇佣体制的影响

人口的老齡化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寿命延长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在一定时期之后必然导致劳动人口减少。目前，日本劳动人口随着人口总数的增加还处于增加状态，1990年为6384万人，1992年为6578万人，1994年为6645万人，1996年为671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据日本国势调查推测，在1995~2000年间，日本劳动人口的年增长率将下降到0.4%左右，21世纪最初的几年日本劳动人口将达到6830万左右的最高峰，然后将出现明显下降（如下表1-1所示）。到2020年日本的劳动人口将比现在减少200万人以上。

当然有人怀疑这种预测的可靠性，认为65岁以上的人口并非完全是非劳动人口，有很大一部分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可以参加工作。近年来日本老年就业人口确有增加的趋势，1990年日本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为300万人，1996年增加到了455万人。但老年就业人口的增加并不能完全弥补年轻人口

日本 1995 年~2020 年劳动人口预测

表 1-1

( 1000 人/%)

年次	总数	男	女	女性化率
1995	66 782	40 127	26 656	39.9
2000	68 297	40 681	27 616	40.4
2005	67 964	40 346	27 618	40.6
2010	66 460	30 071	27 389	41.2
2015	64 191	37 424	26 767	41.7
2020	62 920	36 314	26 606	42.3

资料来源：〔日〕总务厅统计局《平成 7 年国势调查抽样统计结果》，转引自〔日〕《经济往来》10 月号，第 60 页。

注：女性化率指劳动人口总数中女性劳动力所占的比率。

减少所造成的劳动力减少。除了有特殊技能的老年人仍然能够在某些特殊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多数老年人并不适应众多需要一定体力与新知识的工作岗位。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劳动力减少将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和资本、科技一样是现代生产体系的基本要素。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优越的人口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供应。目前，虽然因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1996 年其完全失业率为 3.4%，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演变和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将来日本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必将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老龄化的日趋深化不仅会减少日本劳动力的供给，而且将会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动摇日本企业现有的占主导地位雇佣体制。目前日本大企业雇佣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长期雇佣为特征的终身雇佣制及以年功为基础决定职员工资和职务的年功序列制。日本人口老龄化日益深化的现象必将动摇日本企业传统的雇佣体制：（1）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日本企业继续维持年功序列制必将大大提高劳动成本。日本企业实行的年功序列制在过去年轻劳动力丰富、从业人员中年轻人比例高的情况下，是一种节约劳动成本的雇佣体制，因为日本年轻职工的

工资和中老年职工相比差别十分悬殊。1982年20~24岁在同一企业工作1~4年的职工工资与50岁以上在同一企业工作30年以上的职工工资之比,生产工人为1:2,管理和技术人员为1:2.6,1992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1.9和1:2.6。<sup>①</sup>日本企业正是利用年轻从业人员的低工资来降低人事费用支出,并保证高年功从业人员的“高待遇”。但是随着年轻从业人员的减少,日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必将上升。另外,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间很有可能出现争雇年轻劳动力的竞争,并扩大“中途采用”人员的比例,这又将动摇终身雇佣制。

(2) 在传统雇佣体制下,为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而延长雇佣年限,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也必将加重企业的劳动成本。在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扩大对中老年劳动力的雇佣。但如上述分析,在年功序列制下提高职工的退休年龄必然进一步扩大中老年从业人员的比重,从而使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总之,日趋深化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向日本企业传统雇佣体制提出了难以解决的课题。

### (三)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国民负担及社会保险机构运营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完善和调整,已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保障日本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费用必然相应增加,从而将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第一,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会加重国民负担。1988年日本社会保障费用总额为其GNP的14%,而1955年仅为5.5%。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深,其社会保障费用必然还要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其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必然要相应增加社会保障费用的财源,而这又必将导致国民负担率(税收和社会保险费交缴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度提高。从目前世

<sup>①</sup> [日]《经济白皮书》,1994年版,第681页。

界各国的普遍情况看，人口老龄化是造成国民负担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表 1-2 所示。

国民负担与人口老龄化国际比率

表 1-2

(单位:%)

国别	65 岁以上比率	税务负担率	社会保险负担率	国民负担合计
美国	12.6	25.6	10.7	26.3
日本	14.5	23.1	14.7	37.8
德国	14.6	30.9	22.5	53.4
法国	14.0	34.2	28.4	62.6
英国	15.7	37.7	10.5	48.2
瑞典	17.8	49.63	20.5	69.8

资料来源：〔日〕《日本瞭望》，1996 年 12 月，第 21 期，第 4 页。

注：日本为 1995 年数字；美、英、德、瑞典为 1992 年数字；法国为 1990 年数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论社会保障费用的财源是主要依靠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资金，还是国民支付的保险金，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其国民负担也很重。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的国民负担率并不算很高。但据日本厚生省的预测，在日本经济取得稳定增长且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到 2025 年其国民负担率也将达到 48.5%。<sup>①</sup> 日本政府对其国民负担率的提高十分关注，因为这种收入再分配直接关系到资本的形成和民间经济的活力。1986 年日本举行的第一次行政改革审议会的最终报告指出，即使在老龄化的最高峰时期，也应当将国民负担率控制在比欧洲更低的水平。1991 年日本的第二次行政改革审议的最终咨询报告再次确认，在老龄化的最高峰时期也要将国民负担率控制在 50% 以内。但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进展速度和程度看，若既保证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又实现上述控制目标，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二，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养老保险机构运营的影响。

〔日〕《日本瞭望》，1996 年 12 月，第 21 期，第 3 页。

从财源和支付方式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的运作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摊派方式和积累方式两种。所谓摊派方式就是指保险机构把养老金的支出费用摊派给参加者（被保险人），由参加者通过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共同承担该时期所需的保费支出。所谓积累方式就是指由参加者通过加入保险期内所缴纳保险金积累来承担将来所需的费用，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负担原则。日本的养老保险机构从财源和支付方式上看，基本上是采取了摊派方式。由于 90 年代以前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保险费的收入多、支出少；养老金制度建立时间短，有资格领取的人数少；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人均收入相应提高，从而即使保险费有所提高，其相对负担也比较轻。但是，在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或停滞的情况下出现人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其养老保险机构的运营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进入 90 年代，日本特别会计中保险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保险支出增长速度。

1990~1996 年，日本特别会计保险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 5.4%，而保险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8.5%。<sup>①</sup>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深，日本保险机构支付的养老金自然有增无减，而缴纳养老金的人却将出现减少的现象。目前，许多日本人对养老保险机构的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年轻人对自己成为老年人以后能否领到养老金表示怀疑，并表示不愿意加入养老保险。

第三，人口老龄化对日本财政的影响。由于日本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由保险机构承担，所以目前日本的社会保障费对财政的压力并不大，但从长远看，日本人口老龄化必然增加财政负担。1983 年日本政府为了适应老年社会的到来和改善国民健康保险的财务状况，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 70 岁以上或 65 岁以上 70 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要的医疗费用的 70% 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 30% 由地方财政负担。个人仅需在住院治疗时每日负担 600 日元，门诊治疗时每月负担

<sup>①</sup> 据《日本统计日报》数据计算，1997 年 7 月，第 122 页。

900 日元。今后日本养老保险机构运营困难的解决办、法之一便是提高保险费水平，但这必然增加申请保险费减免的人数，而这些减免额最终应由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以弥补。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只能有增无减。1990 年日本一般支出会计中 15.3% 用于社会保障关系费，到 1996 年，该比例增加到了 16.8%。从短期看，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日本政府试图建立“健全财政”的财政改革难以成功；从长期看，它将使日本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运用的以财政收支引导产业发展的投资型财政政策无法实施。

#### （四）人口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最终主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首先，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人口结构状态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需求结构格局，从而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状态。可以预料，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深，在日本市场上面向婴幼儿及中小学生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将出现相对减少，而面向老年人的用品及服务的需求将出现相对增加。这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将打击面向儿童及中小学生的产业，而面向老年人的产业即因需求的拉动，其发展机会相对较大，因而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一些促使产业结构一定程度调整的动因。

但是，从深层次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成长都与产业结构的适时变动和调整密切相关，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不仅包括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且也包括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动和新产业部门的成长。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要求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和流动。但是由于中老年劳动力对长期居住的地区生活和长期从事的工作岗位比较习惯，并且形成了比较特定的专业技能，因而一般不愿搬迁到其他的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就使得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

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损害，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人口老龄化还将通过影响技术开发和推广制约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开发和推广活动以适应新的生产体系的需要，但从整体上讲老年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接受适应能力都有所减弱，所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必然通过制约技术进步的方式制约影响其产业结构的调整。（2）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求状况也存在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首先，老年人的消费习惯不利于新产业的成长。老龄化社会的中老年人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地位相对上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相对变大。但老年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消费习惯，钟爱长期使用老产品和服务，不容易接受新产品和服务，这就给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开拓造成极大困难。其次，老龄化社会的市场规模相对缩小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是和出生率的降低以及总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相一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一个国家市场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社会不仅因人口增长缓慢而制约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且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消费欲望低，即使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人口数量的国家，老年人比重大的国家其市场容量也相对小，特别是许多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明显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见，人口老龄化将使日本政府提出的通过“内需主导”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实施难度加大。

总之，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问题是日本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课题之一，人口老龄化必然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将在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 二、日本城市地价变动与日本经济发展

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价格的剧烈变动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一国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90 年代以前日本城市地价的不断上涨和其后随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城市地价的大幅度下跌，都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 （一）战后日本城市地价变动概况

在战后很长时期内，日本的城市地价一直居高不下，盛行着所谓的地价不灭“神话”。1992年以前，除1975年以外的其余各年日本城市地价均有明显上涨，其中有三个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年平均上涨率在20%以上。那个时期恰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阶段，在产业结构重化学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生产发展速度较快，生产建设用地需求十分旺盛。第二个时期是1970年前后，大体是在1968~1973年之间。在“伊奘诺景气”（1966~1970年）的推动下，60年代末日本的城市地价出现了大幅度攀升，1966~1970年其年均上涨率为14.9%。1972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论》，1973年2月田中内阁依据该书制定了《经济社会基本计划（1973~1977年）》，提出了要形成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重新安排工业布局，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大规模推行国土开发，建设新的地方城市，以图解决公害、过疏过密等问题。此间银行界也大幅度扩大对房地产及以房地产为抵押物项目的融资规模，使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货币流通过剩，助长了房地产投机活动。日本《东京新闻》社论指出：“1972年‘夏季改造’（指‘日本列岛改造论’）以平均40%多的地价上涨为引线，各种物价持续猛涨”。<sup>①</sup>第三个时期是1988~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化程度加深的一段时期。1987年日本城市地价上涨率为5.4%，其后4年上涨率分别为10%、7.6%、14.1%和10.4%。这一时期日本城市地价上涨率虽然低于前两个时期，但由于经过长时期的价格上涨，其基数已经十分庞大。1987年末日本国土的价格总额为1638万亿日元（约合13.4亿美元），约为当时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因而，即使年均10%左右的价格上涨率其实际影响也要远远高于五六十年代年均20%左右的上涨率。

1990年初，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首先破灭的是日本

<sup>①</sup> [日]《东京经济新闻》，1973年7月4日。

股价这个“泡沫”，日经平均股价在 1989 年 12 月至 1990 年 1 月约为 3.8 万日元，1990 年 2~4 月暴跌为 2.9 万日元左右。同年 9 月末 10 月初日经平均股票收盘价约为 2 万日元，比 1988 年 12 月顶峰时期下降了将近一半。日本地价“泡沫”随着股价的下跌也开始破灭，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价从 1991 年开始回落。根据标价，1991~1992 年住宅土地价格下降幅度，东京地区为 22%，大阪地区为 36%，名古屋地区为 13%。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方面使日本企业的新增投资锐减，另一方面也使各种投机性经营活动大大减少。这就造成日本市场对土地的需求与以前相比明显回落，但日本政府实施的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措施却增加了市场供给。1992 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地价税”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纳税人是在日本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人和个人，税率为 3%。“地价税”出台后，土地持有者纷纷出售土地。虽然日本国土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但市场实际供给量却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于是，日本土地（特别是城市土地）从“不足”的时代转变为“剩余”的时代，并导致日本城市地价持续下跌。“地价税”是日本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对社会利益和经济结构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切除日本经济肌体毒瘤的一次大手术。但由于其政策出台选择的时机恰逢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所以也就加大了日本城市地价的下降幅度。

## （二）城市地价变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地价的剧烈变动，特别是城市地价在 80 年代后半期的暴涨和在 90 年代的暴跌对日本的社会分配、企业投资及国际开放度、政府实现经济政策效果、金融体系的运作以及社会需求状况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地价暴涨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价的大幅度上涨加剧了日本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地价、股价的高涨使此类资产的拥有者获得巨额的资产增益（如下表 1-3）。1987 年日本土地的资本增益总额高达 416 万亿日元，远远超过了同年约为 343 万亿日元的日本 GNP 值。从各部门看，“非金融法人企业”土地

资本增益约为 109 万亿日元，是约为 50 万亿日元的同期日本该类企业盈利的两倍以上，“家庭部门（含个人企业）”方面的土地资产增益约为 267 万亿日元，远远超过了雇佣者所得的 80 年代日本各种类型的经济单位的资产增益

表 1-3

(单位: 万亿日元)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非金融法人企业	土地	7.8	7.6	18.8	63.0	109.3	46.5	72.3
	股票	13.9	16.4	12.6	52.5	36.7	66.5	88.3
金融机关	土地	1.1	0.5	2.6	10.2	19.4	3.9	4.9
	股票	8.2	12.1	10.8	36.9	9.3	57.0	43.2
政府机构	土地	△0.3	0.5	1.2	7.6	14.0	5.4	10.2
家庭(含个人企业)	土地	25.0	30.2	50.2	168.3	267.5	109.9	199.5
	股票	8.1	8.6	9.8	31.8	23.0	51.3	67.1

资料来源：〔日〕经济企划厅《国民经济计算年报》，1991年版。转引自井村喜代子著：《现代日本经济论》第400页。

189 万亿日元。由于各个家庭拥有宅、地资产差距巨大，从而 80 年代后半期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扩大到了 0.56~0.65 的严重程度。另外，地价的暴涨及随之而来的住宅价格狂升加重了日本国民取得宅地及住宅的困难程度。1990 年日本首都圈新出售的公寓和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1985 年同一地区同种房价的 2.3 和 1.8 倍。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公寓、建卖住宅的平均价格对工薪家庭的平均收入倍率从 1985 年的 4.2~5.6 倍一举高涨到 1990 年的 8~8.5 倍。<sup>①</sup> 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及民间金融机构住宅的贷款额约为中等工薪人员平均年收住年收入的 5 倍左右。这样，到 1990 年依靠住宅贷款的中等工薪人员已无法取得平均性的住宅了。不仅住宅的售价高昂，而且房租也大幅度上升，这也使得租房居住者的房租对家庭开支的压力明显加大。总之，地价和房价的暴涨从多方面加剧了日本房地产拥有者与无地无房人的经济差距，并使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状

<sup>①</sup> 〔日〕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编：《最新生活大国关键用词》，第 53 页。

况严重加深。

第二，地价的暴涨使在日本开设新企业极为困难。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既需要原有企业不断调整其生产经营领域，也需要大量新企业不断涌现并且成长壮大。新企业的大量涌现和顺利成长是一国经济保持竞争活力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开业费用的高低往往又是影响新设企业数量多寡和经营状况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一般地讲，开业费用越高，新设企业的开工率就低。一个新设企业的开业费用不仅包括购买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的开支和相应的配套流动资金，而且也包括购买或租借生产经营场所所需要的费用。因而土地、厂房等不动产价格的高低往往成为影响新设企业难易程度的重要条件。据统计，在日本新开设的企业中，购入不动产的费用约占开业费总额的 75%，而其中大部分为购买土地的开支。<sup>①</sup> 1982 年度在日本新开设一个企业的开业资金平均为 500 万日元，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1991 年度则上升到了 1900 万日元。另外，城市地价高昂已成为阻碍国外资本在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材料计算，日本城市地价远远高于欧美诸国，按每平方米计算，东京地价比纽约地价高 7.9 倍，比伦敦地价高 4.2 倍，比巴黎地价高 4.5 倍，比法兰克福地价高 3.1 倍。<sup>②</sup> 由于地价高，房租必然随之高昂。一些国外公司的经营稍有不善便会撤离日本。在 1995 年 8 月，原国际上十几家大银行的亚洲总部均先后搬出了东京。

第三，地价高昂严重地抑制了日本政府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降低了政府实现经济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要维持市场的竞争秩序，还要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设施，并对宏观经济景气循环进行调节。但在地价高昂的情况下，政府提供公共设施和调节经济发展的机能

<sup>①</sup> [日]《经济白皮书》，1996 年版，第 379 页。

<sup>②</sup> 孙执中：《试论 1991～1995 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载于《世界经济》，1998 年第 4 期。

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公共工程建设必须进行征地，因而土地价格上涨就成了阻碍很多项目按期完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东京的都市二环路的完工就是由于政府无力出资购买虎之门至新桥仅 1 350 米长的一段土地而拖延了好几年。该项工程的土地购买费为 4 287 亿日元，约占工程总费用的 99.7%。东京市政当局为改善人们生活环境而建造人行道、公园、儿童乐园等公共设施的努力也常常被高昂的土地价格所阻滞。另外，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举办公共工程并通过其投资乘数效果的发挥来刺激经济增长。正如上面所述，在地价高昂的情况下，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的投资大部分被用于购买土地，而没有主要用于购买各种建材和增加劳动力雇佣方面。这样就势必大大削减财政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应产生的投资乘数效果。尽管目前日本的城市地价已远远低于泡沫经济时期，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高的水平。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虽然日本政府屡次扩大政府预算规模，并一再追加新的预算支出，扩大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1996 年日本中央财政支出中公共事业费比 1990 年增加了近一倍，但日本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从一定程度上讲，日本较高的城市地价也是影响其财政投资调节经济景气循环效果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地价的暴涨既是日本 80 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促成日本泡沫经济的核心环节之一。从现象上看，所谓泡沫经济就是指土地、股票等资产的价格持续出现无法以其基础条件解释的上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其实质是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而造成二者的严重脱节。从其形成的初始动力来看，80 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长期实行的超缓和货币金融政策是造成日本泡沫经济最重要的原因。80 年代后半期，日本货币供应量 ( $M_2 + CD$  的平均余额) 的增长率一直远远高于名义 GNP 的增长率。1986~1987 年前者竟为后者的两倍左右，其后仍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这种供应量过多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股票等资产，必然会造成各种资产价格飞涨。利用这种股价上

涨，上市公司就可以通过发行新股、发售可转换公司债券及附有股份购买权的公司债券进行融资。其结果是大企业获得了超出设备投资所必需的剩余资金，它们在偿还银行贷款的同时，又投机性地运用资金，这样又加速了股价及地价的上涨。上市大企业由于可以通过上述渠道筹措到成本较低的资金，因而已无必要向银行借款。失去原来贷放对象的银行为发展自身的业务，必然把其贷放业务向中小企业和个人扩展。银行提供给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股票和土地，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股票和土地的投机行为。

从其具体的发展过程看，日本城市地价暴涨是促成日本泡沫经济的核心环节之一。首先，在地价高涨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进行借款的担保额度。进行抵押担保贷款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放款形式。由于中小企业其余资产少，一般都以土地和厂房设备为抵押品。80年代后半期，许多日本商业银行都持有土地价格不灭的观念，从而出现了银行既不认真审查其资金的真正用途，也不严守担保的份量标准。有的银行甚至估计土地要涨价就以地价百分之百以上的份量加以担保操作。其次，地价持续上涨也使银行放心对购买土地的行为进行融资。80年代后半期，日本银行界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如果企业或个人取得贷款是为了购买土地、股票，那么银行就立即进行融资。因为当时的银行界认为随着地价、股价的上涨，借款方一定有能力还息。上述两方面相互作用使日本银行界对外贷款规模不断膨胀，从而最终形成了影响深重的泡沫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地价和股价的过份膨胀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泡沫经济迟早要破灭。泡沫经济破灭后，地价和股价的下跌本是不正常的资产价格向正常水平的复归。这种复归虽然可以有助于解决资产价格过份膨胀所引发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但短时期内地价的暴跌也会产生众多新的严重经济问题。

第一，地价的暴跌造成日本金融机构所持不良债权激增。地价暴跌、房地产交易陷入停顿，使一些不动产公司的经营极

为困难，并且大批破产。这样，向那些不动产公司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不仅无法收回利息，而且实际上地价远远低于担保价格，即使卖掉用作担保的土地也不可能全部如数收回贷款。不仅如此，从事非房地产业务的企业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的消费不振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其经营也十分困难，并出现了大量破产现象。而金融机构对这类企业的贷款也多以企业所持有的房地产为抵押品，因而地价的暴跌也使银行无法通过变卖这类企业的贷款担保品来收回其对外贷款本息。据日本大藏省 1998 年 1 月公布的统计结果，截止到 1997 年 9 月末，日本各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和信用组合、信用金库、农林系统的金融机关所持不良债权高达 35 兆日元。<sup>①</sup>其实这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数字，据美国有关机构最近估算，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可能高达 50~100 兆日元。

第二，地价的暴跌使日本银行的贷款能力下降，并出现“惜贷”现象。所谓“惜贷”就是指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银行为提高自有资金比例和确保贷款的安全性而不愿扩大对企业放款的现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制定的《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比率达不到 8% 时，国家金融当局应当对其下达改善业务的指令。单纯从事国内业务的银行、信用金库及信用组合等金融机构，自己资本比率低于 4% 时，国家金融当局就应当对其下达改善业务指令。按着自有资金比率的计算公式，在银行的自有资金当中包括银行股票 5% 的估价额。因而，股票价格水平对一个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影响极大，而土地等不动产的价格水平是影响股价的重要因素。90 年代以后日本股价、地价的暴跌使日本银行业的自有资金比率急剧下降，1992 年 8 月曾出现了所有的日本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都低于 8% 的现象。在股价难以迅速回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业为提高自有资金比率不得不一方面增加附属债务，另一方面削减资产规模，降低风险资产比重。这就最终形

<sup>①</sup> [日]《读卖新闻》，1998 年 1 月 9 日。

成了日本银行的“惜贷”现象。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既出现了有的企业因生产设备的严重过剩而大幅度减少对贷款需求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有的风险企业苦于银行“惜贷”而难以筹措到所需资金的情况。而这两者都是影响日本经济从长期停滞走向复苏的重要因素。

第三，地价暴跌也是 90 年代日本消费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80 年代后半期，土地、住宅、股票的价格高涨和资产价格的庞大化，通过住宅需求和有效消费需求的扩大，有力地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增长。据统计，80 年代末日本家庭部门在土地买卖中纯收入余额高达 10 万亿日元以上。同时，在超低利率政策和资产价格庞大化的情况下，日本家庭部门的贷款担保能力大大增强，消费信贷额急增，1985 年为 9 万亿日元，1987 年便上升到了 25.5 万亿日元，1989 年又进一步上升到了 32 万亿日元。<sup>①</sup>这除了促进住宅建设迅速发展外，也使汽车、贵金属、大型电视机、大型冰箱、高级衣料等贵重消费需求及高级娱乐需求急剧增长。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来自资产价格高涨方面推动日本社会需求扩大的因素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消失了，本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对经济景气起支撑作用的个人家庭消费也陷入了严重的低迷状态。从 1990 年开始，日本土地、股票持有者便减少了对进口汽车、宝石、裘皮服装及高级绘画的需求。进入 1992 年以后，日本的国产轿车、家用电器的销售额、商店的营业额以及旅行社的收入额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种家庭消费锐减进一步扩展到生产领域，使日本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和设备投资长期陷入低迷状态。日本在 90 年代之所以会发生家庭消费锐减的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亲眼目睹了资产贬值对企业、银行及证券公司的影响，从保护自己未来生活的意识出发，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欲望明显萎缩。日本地价暴涨之后的暴跌对其经济造成的诸多消极影响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完全消除，而这必将对日

<sup>①</sup>〔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第 403 页。